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

——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陈家洋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关键词:丁玲《解放日报》文艺栏 编辑实践 启蒙话语 革命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6)04-0044-03

丁玲是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之前,文艺副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1年9月15日《解放日报》以对开两版形式出版,文艺稿件发在第二版左下方,没有报头;二是从1941年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改为对开四版,文艺稿件发在第四版的下半版,占全报八分之一版面,有专门的报头“文艺”。到改版之前,文艺共出版111期。其中丁玲主编的期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论者认为是106期,106期以前由丁玲主编,106期后由舒群主编^[1];也有论者认为是102期^[2]。本文采用丁玲本人的回忆:“到1942年3月11日出满了100期的时候,我就离职……一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3]36}

在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丁玲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使其成为根据地的重要文艺阵地,对延安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文艺”出到一百期的时候,出版了3期“百期特刊”(第100、101、102期)。“百期特刊”刊发了刘白羽、艾青、欧阳山、丁玲、奚如、罗烽、陈荒煤、舒群等人的文章,既肯定了文艺栏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了不足。欧阳山的文章《祝“文艺”底百尺竿头》对文艺栏的成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文艺》的发刊,是1941年延安文

艺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它对革命,对艺术,有了一样多底新贡献。它扩大了文艺运动及其影响,广泛提高了咱们边区的文化水平,充实了边区人民底精神生活。它发现了大批新起的艺术人才,同时使一般人对这以‘五四’运动做传统精神的新文学了解得更加具体,同时使新文艺在一般人底并非完全没有成见的心目中占了一个固定的位置。”^[4]文艺栏取得如此成绩,作为主编的丁玲自然功不可没。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量级的人物,她既是一个创作宏富的作家,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编辑家。早在1928年,丁玲就参与编辑上海《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中,曾编辑《红黑》月刊、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解放日报》文艺栏、《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等多种重要报刊。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尚未召开,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丁玲还没有彻底受到体制的规训,以“启蒙”为核心理念的五四传统依然是她的精神武器,揭露、批判生活的阴暗面以及民族文化历史中的缺失往往是她的创作和编辑活动的兴奋点。此外,“民族—国家”诉求又使丁玲对革命充满期待,对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认同,丁玲有意识地调整着自己的话语表达内容和方式,使之与革命话语更相契合。如果说作为作家,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更多的是基于“启蒙”指向,那么作为编辑,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则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

种话语的交织。对此进行研究,可以彰显其内在的逻辑纠缠,并从中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二

丁玲兼有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在编辑主体身上相互作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

在延安时期的一些作品,如小说名篇《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着眼于一种将要到来的新生活,而落笔之处却是对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在《夜》中,作者以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将主人公何华明在革命背后的生存困境凸现出来,揭示了民族文化历史中的某些缺失。小说结尾是“天渐渐地大亮了”,而小说主体却是“夜”。前者可视为革命前景的象征,后者则可视为民众生存困境及民族文化历史中的缺失的象征。这样的话语方式同样存在于《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中。《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见到了种种令她困惑和不满的事情,作者借陆萍的眼睛,揭露了生活的阴暗面,显示出丁玲积极的理性批判精神,作品中不管道路多么艰难,陆萍却始终没有失去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身心都受到巨大的磨难,最后走出霞村,走入虽然有些暧昧但却非常广阔的新天地,在小说中,无论是叙事者“我”,还是小说主人公贞贞,都以“新”为指归(如这样写“我”：“我显得有些疲乏,却又感觉着一种新的生活要到来以前的那种昂扬”^{[5] P15}；这样写贞贞：“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5] P19})。可以说,丁玲在创作时很大程度上基于以启蒙为核心理念的五四传统,其精神指归则是革命将会带来的新世界、新生活。

在刚进入解放区时,丁玲在其主编的“红中副刊”编后记(1936年11月30日)中提出,要以笔为枪,将笔作为战斗的武器^{[5] P1},这种口号式的表达显示出刚进入解放区的丁玲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和强调。但随后丁玲渐渐沉潜下来,在写于1938年夏的《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中,丁玲表示了独立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时时记住自己的责任,永不退让,永不放松,才是我们应有的精神,这未到群众中去,只求能适合群众,而绝不取媚群众。”^{[5] P104}这是启蒙群众的知识分子,而非后来那样,是被群众改造的对象。1940年的《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提出她编辑的《文艺月报》要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5] P32}。这种批判性的、指斥问题的编辑指针显然是带有启蒙意图的。于是1941年10月所写的《我们需要杂文》(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该文指

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5] P51}因此,丁玲提出,要提倡“鲁迅式”的杂文。

这样的启蒙话语自然会进入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实践中,她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以同样或相类的价值标准去筛选稿件,优化信息。只要阅读一下《百期特刊》上的纪念文章即可得出这种结论。刘白羽在《新的气息》(“文艺”第100期)中盘点了百期“文艺”栏登载的优秀小说,文中所详细分析的几篇小说,如洪流的《乡长夫妇》、鸿迅《厂长追猪去了》、黄既的《老实人》、叶克的《科长病了》等,均为“问题”小说。刘白羽肯定了这些作品的价值^[6]。从前面所引用的欧阳山的《祝文艺底百尺竿头》对文艺栏成绩的肯定中也可以看出,欧阳山明确认为文艺栏所传播的是五四精神传统。另外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第100期)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的批判意识^[7],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第101期)则希望文艺栏多刊登杂文,变成一把使人战栗而喜悦的短剑^[8]。这些文章的指向都和丁玲《我们需要杂文》相一致。作为主编,丁玲的启蒙意图不可避免地要投射到作为客体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中。

报纸是一种公共性很强的传播媒介,编辑往往被称作“把关人”,传播学的奠基人库尔特·卢因就认为:信息的网络传播中布满了把关人,他们负责把关,过滤信息的进出流通^[9]。作为《解放日报》文艺栏“把关人”的丁玲,其编辑意图体现在如何使传播的信息合乎目的,这个“目的”某种程度上就是丁玲的启蒙立场。在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时,这个“目的”具有存在的空间;当《“三八节”有感》(丁玲)、《野百合花》(王实味)等文章引起批判时,这个“目的”就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龃龉。事实上,几乎在丁玲辞去文艺栏主编职务的同时,延安主流意识形态就开始对其进行纠正。

三

但是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编辑活动必须付诸具体的实践,而不是靠计划或构想来完成。作为《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的丁玲,必须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确立编辑思路,因为编辑是传播领域中的一种活动,与文艺创作相比,带有更多的公共性。如此一来,编辑身份又必然促使丁玲以革命任务作为具体目标。

在“百期特刊(二)”上,丁玲发表了《编者的话》,对百期“文艺”进行了回顾,对“得”和“失”进行了总结。在该文中,丁玲指出:“《解放日报》一开始,文艺栏就担负着几层任务:①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②

尽量培养提拔青年作家^③反映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④提高边区文艺水平。^{⑤10}在这四层任务中,第四层建立在前三层基础上,因此稍显抽象。除此之外,前三层均有具体的针对性,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是因为当时大批文化人进入延安。提拔青年作家则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要求。反映边区和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是《解放日报》党性原则的要求,也是读者的要求;另外,丁玲在“民族—国家”话语诉求之下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产生了认同(只要从丁玲之前和之后都曾亲自到前线去工作的事实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是因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产生认同,丁玲才会将这一层列为文艺栏的重要任务之一。可见,作为主编的丁玲对党的宣传目标及读者需求的把握都是比较到位的。

编辑的实践性特征影响着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首先,既然编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那么它的进行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当时的解放区经济紧张,条件恶劣,更兼组稿困难,据丁玲回忆,约稿时她一个人踽踽独行,来回30里路,还得抓紧时间,免得在外单位吃饭,增加主人的麻烦^{③37}。在《编者的话》中丁玲这样说道:“当然其中也的确有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譬如在延安的作家几乎全是杂志的作家(写长文章的),不为报纸写作。而短小的报告速写之类又因交通的关系,收不到很多稿子。^{⑤10}丁玲所说的第三层任务(“反映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不像第一层、第二层那样做得很到位。所以,丁玲在总结百期文艺栏的不足时,首先就提出这一点:“应该受责备的是没有尽最大的可能,征求搜取反映前方生活的速写,成为《文艺》的遗憾,这种最为读者欢迎的稿子,登载得太少了。^{⑤10}”所以,今天我们在翻阅《解放日报》文艺栏时,不能因为没有看到很多的关于前方战事的文章而得出结论,认为丁玲作为文艺栏的主编,依然是以五四精神传统作为选稿标准,从而忽略了丁玲对革命话语的认同。

其次,由于对革命话语内在的认同,丁玲在编辑实践中很重视党的宣传指示。据丁玲回忆,博古曾多次对她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关于“报屁股,甜点心”之说,丁玲在《编者的话》中也曾提到,这说明无论是社长博古,还是文艺栏主编丁玲,都将办副刊当作一件重要的革命工作来做,丝毫没有轻视之意和怠慢之心。关于“《轻骑队》”之说,《轻骑队》是当时的一个大墙报,登的文章短小精悍,对延安生活,有所批评和针砭。因为博古一再强调不搞《轻骑队》,强调《解放日报》的党性原则,所以文艺栏一开始只登小说、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很少。

即使有个别论文、小说、诗,引起读者一些意见,报纸一般都不答复,也不发展争论^{③37}。正因如此,“百期特刊”(二)(第101期)上刊载的奚如的《一点意见》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在这一百期中,我很惋惜地没有看到应有的因文学上的各种问题所引起的严肃而热烈的论战。^{⑤11}”丁玲在《编者的话》中也总结了这方面的不足,认为对于文艺运动的自由讨论,作为一个党报的副刊却默默无言是要不得的^{⑤10}。

最后,读者的需求在丁玲的编辑活动中也起着很大作用。这里以《解放日报》文艺栏提倡杂文为例。提倡杂文固然有着启蒙和独立批判的意图,但在丁玲的编辑实践过程中,报纸应该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当外在的条件(读者的要求)和内在的动机(启蒙意图)双方形成默契时,编辑活动才能获得编辑主体所期望的成果,提倡杂文便是如此。丁玲曾回忆说,文艺副刊在改版前后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长的特点,于是为了合乎读者的需要,便设法改正,使文艺栏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于是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此后,报上逐渐出现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杂文,但他们的杂文乃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有人说:“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这样渐渐地就有一些批判延安生活现象的杂文出现,却也没有多大反响,直到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现,这类杂文却成为革命话语的对立物了^{③30}。因此,在探讨丁玲提倡杂文的原因时,仅仅落实丁玲的启蒙立场,却忽视编辑活动的实践性特征,是不够全面的。

参考文献:

- [1]冯井.中国文艺副刊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420.
- [2]黄蓉.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
- [3]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C]/艾克恩.延安文坛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4]欧阳山.祝《文艺》底百尺竿头[N].(延安)解放日报,1942-03-1X(4).
- [5]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 [6]刘白羽.新的气息[N].(延安)解放日报,1942-03-11(4).
- [7]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N].(延安)解放日报,1942-03-1X(4).
- [8]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N].(延安)解放日报,1942-03-11(4).
- [9]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205.
- [10]丁玲.编者的话[N].(延安)解放日报,1942-03-1X(4).
- [11]奚如.一点意见[N].(延安)解放日报,1942-03-1X(4).